

《南都学坛》汉代文化研究论文集（七）

（1998 年第一期——1999 年第五期）

南阳师范学院图书馆

目 录

刘邦与其功臣集团关系析论·····	夏增民	(1)
略论东汉江南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陈昌文 王福昌	(5)
汉画所见汉代渔业生产初探·····	王玉金	(8)
西汉梁国与七国之乱的平定·····	高建立 刘大伦	(12)
中州士人与汉代政治·····	黄宛峰	(14)
试析河南汉代学术文化繁荣的原因·····	刘太祥	(19)
河南汉文化精神·····	郑先兴	(25)
河南汉墓壁画艺术·····	黄雅峰	(30)
汉武帝的“六条诏书”及汉唐地方监察法规·····	袁 刚	(34)
略论冒顿单于时期的匈奴人口·····	袁祖亮	(40)
河南汉代体育活动·····	李陈广 韩玉祥 王仲伟	(43)
论《监铁论》史学思想·····	郑先兴	(47)
试论秦汉纺织业中的商品生产·····	陈昌文 肖 倩	(51)
略论汉代文物中的滑稽形象及其表演艺术·····	崔 华 牛 耕	(56)
试论“楚声”在汉代“相和歌”中的主导地位·····	冯建志	(58)
试析河南汉代经济繁荣的原因·····	刘太祥	(60)
南阳汉画与汉史研究·····	王玉金	(66)
汉代官府藏书的管理·····	李秀娥	(72)
河南汉代文化特色·····	黄宛峰	(76)
钱范述略		
——南阳两汉铭刻辑考之二·····	刘绍明 曾照阁	(80)
秦汉园林的特点与意境创造·····	常跃中	(83)
论汉代音乐文化的繁荣与成因·····	李荣友	(85)
论曹操之“通脱”及其对世风的影响·····	王永平	(88)
荀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	郑先兴	(93)
浅谈汉画像石与汉代“天人合一”思想·····	孙怡村	(97)
南阳汉代画像砖的研究现状·····	李 骁 范 海	(99)
河南汉画像石艺术·····	黄雅峰	(101)
论西汉时期陵县的正式形式·····	朱顺玲	(104)
从汉画看汉代服饰·····	王 强	(107)

刘邦与其功臣集团关系析论

夏 增 民

摘要 刘邦能在楚汉战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实有赖于刘邦阵营内部两个强大的实力集团即封侯者集团和诸侯王集团。封侯者集团由丰沛故人集团与归依集团构成。其中,丰沛集团对刘邦集团势力起着凝聚作用,是其实力核心。而归依集团是刘邦势力的谋略层,与丰沛集团归合,结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团结的作战和谋略核心,它是刘邦立于不败之地的智力基础和西汉初期政权的支撑力量。诸侯王集团的形成是刘邦在敌强我弱形势下迫不得已而采取的权宜之计,是双方以纯粹的利益目的结成的联盟。刘邦在起初对他们是重在利用,兼有防备,直至项羽破亡,双方反目,诸侯王遭到屠灭的命运。

关键词 西汉 刘邦 君臣关系 集团政治

1 丰沛故人集团是籍贯在刘邦早年活动频繁、颇有影响的丰、沛、砀及其附近地区(大致在今鲁西南、皖东北、苏北地区),并且与刘邦关系密切的一个物群体。秦末,刘邦为泗水(在今江苏沛县东)亭长时,这个集团已经初具规模,在彼此的频繁交往中,逐渐形成了共同的利益关联和心理投合,这构成他们事业的基础,因此,在未起事前,它就作为一个以刘邦为中心、相互之间有归同趋向的帮派出现了。刘邦还是平民的时候,萧何即“数以吏事护高祖。高祖为亭长,常佑之”^①。而且,刘邦触犯秦法,夏侯婴“坐高祖系岁余,掠笞数百,终以是脱高祖”^②,主动为其开脱责任。丰沛故人集团是沛县起义的基本力量,当刘邦率领砀郡的部下兵临沛县城下时,其中一部分人与刘邦里应外合,夺取了沛县,他们与砀郡的人员一起初步构成了刘邦军事政治集团。刘邦部队反秦义军主力地位的奠定,主要是丰沛故人集团的功劳,他们以作战勇猛为刘邦集团树立了威信。《史记》在樊哙传中载其“先登”10次,“斩首”11次,“益爵”加官16次,就是这样的战功,使刘邦立足于众诸侯之中,获取了参与大政商讨的资历。

丰沛故人集团在反秦和楚汉战争中对整个刘邦军事集团起着凝聚作用,是刘邦集团势力的实力核心。在战争中,战事反覆,胜负无常,但无论成败,丰沛故人集团始终跟随刘邦,维持着这支队伍的基本稳定。蒯彻侯周继,沛人,刘邦起事时以舍人从,“军乍利乍不利,终无离上之心”^③。及彭城(今江苏徐

州)之败,士卒多逃散,夏侯婴驾车载刘邦西走;曹参“围取雍丘。王武反于外黄,程处反于燕,往击尽破之”^④;灌婴“从还,军于雍丘”,击败叛将魏公申徒,与曹参会师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樊哙“还至荥阳,以将守广武一岁”^⑤,与主力成犄角之势,最后,丰沛故人集团争取韩信、张耳支持,初步稳定了局势。正是丰沛集团的这种凝聚力,使得刘邦集团散而复聚,屡败而弥坚。因此丰沛集团就成为刘邦号令天下的资本,使各诸侯不敢轻视和轻易叛离刘邦这股力量。刘邦与他们结成一个兴衰与共的稳固集体,在许多问题上保持同一步调,这时候,刘邦就成为集团的利益代表,集团成员在拥护刘邦的同时,也就维护了自己的切身利益。因此,他们毫不保留地支持刘邦,同时,刘邦也不得不顾及集团成员的愿望和要求,他们为这个集团的巩固、发展和壮大不遗余力。

由于这种在实际斗争生活中建立起来的关系,丰沛集团在刘邦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汉朝建立后,刘邦做了皇帝,丰沛集团也在政治上得到回报,位显一时。刘邦在开始时“所封萧曹故人所亲爱,而所诛者皆生平所仇怨”^⑥,初置18侯中,刘邦起事的基地——丰沛砀地区的人员占了11个,而余下的几乎全部与这三角地带邻近。《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侯年表》中载147侯,籍贯在丰沛砀三地的51人,占了1/3强。朝中重臣更是如此。以三公为例,首任丞相为萧何,刘邦临终遗言,萧何死,曹参、王陵、陈平依次接替,而且从上表显示,直至孝文帝后元二年,担任丞相

一职的仅陈平、张苍不属丰沛集团,但二人都是与丰沛集团关系较密的人物。太尉一职不常设,所任卢绾、周勃、灌婴全为丰沛集团成员。首任御史大夫为周苛,周苛死,其从弟周昌代,周昌迁赵王相,其属吏赵尧代,其后任敖、曹窋、张苍接任此职。周苛、周昌,沛人,曾为泗水卒史,是刘邦的老部下;任敖也是沛人,“少为狱吏……素善高祖”^⑦;曹窋为曹参之子;赵尧籍贯不明,但其为周昌属吏,又经周昌推荐,关系不会很远。汉政权建立后,刘邦把战争中与丰沛集团唇齿相依的亲善关系移植到政权建设中,使其成为政权结构的主体,反映了刘邦对他们的依赖程度,而事实上,他们也的确履行了他们的职责。

但是,在紧密团结的背后,刘邦对丰沛集团也不时产生信任危机,主要集中在萧何和樊哙身上。楚汉战争中,刘邦在关东同项羽争夺,而萧何“守关中,侍太子,治栎阳,为法令约束……专属任何关中事”^⑧,主持着大后方各方面的事务,拥有很大的权力,前线能否持久,一决于何,刘邦不能不对萧何有所疑虑,这是事之常情。而樊哙见疑则是刘邦病危时,受人诋毁所致。

刘邦对于丰沛集团的疑虑是没有必要的,丰沛集团始终保持着原先对刘邦的支持和忠心,这从前后各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到,而刘邦也没有扩大疑虑的范围和程度,萧何仅仅以多送子侄,多置田地就打消了刘邦的不安情绪。这种情况的产生是皇权巩固时期所必然出现的,它超越感情和主观意愿,从而带有一种规律性。事实上,刘邦最终还是将希望寄托在丰沛集团身上,他在临终前,确定了以丰沛故人集团为主的丞相名单,告诫丰沛集团成员,“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⑨,提示他们警惕天下情势,防止有危害中央皇权的势力出现,共同维护汉政权的稳固。此时,刘邦的倚重倾向,依然是丰沛故人集团。

2 刘邦作为反秦主力的地位确定后,吸引了不少有识之士的加入,从而形成归依集团,其中包括平民出身的陈平、酈食其酈商兄弟、韩贵族后裔张良、秦故御史张苍等,这部分人由于其突出的才能和战功获得了丰沛故人集团尤其是刘邦的认同和信任,并对其委以重任,言听计从。在反秦和楚汉战争中,刘邦的军事力量一直处于较弱的态势,为了弥补这一缺憾,刘邦的策略是以谋略胜,用精心的谋划代替攻城野战力量的不足,把谋略转化为战斗力,他对归依集团优厚有加,无疑是出于这个目的,他曾对项羽说:“吾宁斗智,不能斗力。”^⑩说明刘邦已经掌握了自己的优势,以己之长,攻彼之短。归依集团构成刘

邦政治军事集团的谋略层,就改变、补充了它原先单一武将结构,使之作为一个健全完整的政治势力走上政治角斗场。

谋略层的形成只是使刘邦具备了胜利的条件,要达到最终的胜利,归依集团与丰沛故人集团必须进行归合,达到情感和利益上的高度统一,这就需要双方共同培育相互之间进一步接受的精神。然而,二者的合流并不是一拍即合的。刘邦自起事以来,投奔者日众,但其中不乏“顽钝嗜利无耻者”^⑪,这就损害了刘邦集团的形象,从而引起丰沛集团许多人的不满。陈平初投刘邦,即受到周勃、灌婴的攻击:“臣闻平居家时,盗其嫂……平,反覆乱臣也”^⑫,这实际上反映了整个丰沛集团的疑虑。但刘邦了解到陈平并非平庸之士,不久就恢复了对他的信任。由此可见,丰沛集团与归依集团归合的基础是才能的展现和利益的共享。刘邦在当时的目的是:最大可能地吸纳人才,壮大自己的力量,也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对项羽作战的最终胜利,而最大限度发挥这部分人效力的办法是对他的部下一视同仁。归依集团归合于丰沛集团,无疑是刘邦所愿意看到的,他通过对归依集团的高官厚爵表示对他们的重视。陈平一到汉营,即“拜为都尉,使为参乘、典护军,诸将尽欢”^⑬。刘邦以此昭示众人,目的是收拢人心,从诸将的反映看,他的策略显然获得了极大成功。同时归依集团也认识到,只有双方的和谐、圆满的归合,才能击败项羽,因此他们积极献计献策,主动消弭两个集团之间的隔阂,陈平“常出奇计,救纷纠之难,振国家之患”^⑭,他对刘邦集团可谓不遗余力。归依集团的这些举措,与刘邦用人不疑、人尽其用分不开,陈平献计以重金收买项羽将领,刘邦“出黄金四万斤与陈平,恣所为,不问其出入”^⑮,完全摆脱了刚开始时的疑虑,而这些人屡献良计,也正是对刘邦的回报。

丰沛集团和归依集团相互认同和交融,进而形成了共同的利益和目标追求,最后结成了一个相对稳定、团结的作战和谋略核心,这是刘邦立于不败之地的武力和智力基础,是西汉初期政权的支撑力量,刘邦能得天下,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发挥了这样的集团优势。而这一优势的展示,归结于丰沛集团和归依集团的归合;二者的归合,使归依集团取得同丰沛集团同等的地位,这样,一个更团结壮大、更富于生气的利益集团——封侯者集团便构成了。

在战争中归合形成的封侯者集团在汉政权初立时,共同维护了政权的稳固。封侯者集团和汉政权之间存在着一种牢固的互动关系,而此二者又与刘

氏皇族之间建立了一个相对稳定又相互补充的有生命力的政治三角架构。刘氏政权是他们利益的体现和保障,任何危害刘氏政权的企图,都会受到他们强烈的反对。在铲平异姓诸侯王过程中,封侯者集团追随刘邦左右,成为平叛的主谋或主将。刘邦死后,吕后擅权,专封诸吕,封侯者集团多持不合作态度,对吕氏敷衍了事。然而吕后一死,这些功臣联合刘氏皇族,尽诛诸吕,复立刘氏,迎立代王刘恒,是为文帝。封侯者集团最终以极强硬的手段维持了他们与刘氏政权的生死相依关系。

3 刘邦在封侯的同时,又根据战争的形势分封了7个诸侯王。他们是韩王信、赵王张耳、燕王臧荼、齐王韩信(后为楚王)、淮南王英布、长沙王吴芮。刘邦封诸侯王不是出于本心,而是在汉弱楚强的形势下,为壮大自己力量,孤立项羽,广泛结交同盟的结果。这样,项羽四面受敌,军事实力在频繁的往来调遣中消耗殆尽,而汉军积蓄实力,承楚军之弊,一举而定天下。

以是观之,在楚汉战争中,诸侯王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他们为统一局面的重新出现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诸侯王本身却又威胁着这一局面的进一步巩固,诸侯王在战争中形成了强大的实力,使得他们均有问鼎之心。项羽分封甫定,内战已显端倪,首先是田荣与彭越、陈余联军反楚,臧荼又杀无终王韩广而夺其地。这一状况的出现是由于项羽分封的不公,当各诸侯王的要求没有被满足的时候,他们就要横行天下,一逞勇武。这完全是一种利益驱动,关东战起,刘邦袭占关中,随即挥军东指,“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阳降……魏王豹将兵从”^⑧,被陈余赶走的张耳也跑来投奔,这是因为刘邦能分所得利益与之共享,“降城即以侯其将,得赂则以分其士,与天下同其利”^⑨,而且,刘邦在当时实力仅次于项羽,是唯一能与项羽抗衡的势力,他们追随刘邦是为了重新瓜分胜利成果。但是,彭城一战,刘邦大败,于是,“诸侯见楚强汉败,还皆去汉复为楚”^⑩,叛降无常,无疑说明了各自所固有的利益驱动力。

经此波折,刘邦加深和坚定了诸侯王存在分离倾向这一认识,这就决定了他和诸侯王关系的某些方面。作为一个务实的政治领袖,刘邦对归附他的诸侯王始终持不太信任和提防态度,他唯恐自己遭受项羽众叛亲离的命运,更担心他们独立发展或与项羽结盟。为了有效地控制诸侯王,刘邦对待诸侯王集团是有侧重、有区别的,各王中,赵王张耳、长沙王吴芮、燕王臧荼的实力较弱,但由于起事较早,在

当时还有很大的号召力,刘邦对他们施以优抚羁縻措施,给予高爵厚赏,不使他们归附项羽。“(张)耳庸材,因人成事,不足忌耳”^⑪,刘邦大可放心,并将女儿鲁元公主嫁给其子张敖,关系深厚若此。长沙王吴芮因远离权力斗争中心,国小势弱,不对中央皇权构成威胁,加之吴氏父子努力迎承刘邦,刘邦分封同姓为王,长沙王频频领头上表,赢得刘邦好感,专门制诏表彰:“长沙王忠,其定著令”^⑫,长沙王因此得以传国。燕地处于楚汉相争的边缘地带,臧荼在战争中未起什么实际作用,刘邦以臧荼为王,不过是其政治手段的一种展现而已。总之,这三王比较容易对付。

但是,韩信、彭越、英布却不同,他们据有很强的实力,是楚汉战争胜负的关键。蒯彻曾对韩信说:“当今两主之命悬于足下,足下与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⑬彭越的实力也不可忽视,“当是之时,彭王一顾,与楚则汉破,与汉则楚破,且垓下之会,微彭王,项氏不亡”^⑭。英布也是在当时诸侯中享有威名,他们的作用比其他诸侯王大得多,所以,刘邦同他们的关系在方式、方法上有所不同,对他们采取的手段有一个演变过程,在起初是重在利用,兼有防备,刘邦想打败项羽,又怕有人仿效项羽与自己争夺天下,也就只能如此了。

彭城之战稍微改变了各诸侯间的力量对比,刘邦被暂时削弱,韩信、彭越的地位却显得更突出,三者的力量,开始成为楚汉争夺的中心对象。刘邦积极主动地采取措施,施以笼络,引以为援,韩信为其上将军,本来已受宠幸,这时请兵3万,愿北击燕赵,刘邦慷慨应允。又派卢绾、刘贾率兵渡过黄河支援彭越,并封彭为魏相国;同时使随何以淮南王为利诱说服英布叛楚归汉。这三家被团结在刘邦周围,对彭城战后刘邦集团实力恢复和战争的最终胜利起了决定作用。

尽管如此,刘邦也并没有放松警惕。魏豹背汉,刘邦使韩信与曹参、灌婴击魏;汉楚在荥阳、成皋间(在今河南荥阳一带)长期对峙,韩信、张耳北击燕赵,刘邦又将灌婴及其郎中骑士归韩信指挥;后又使曹参以右丞相职随韩信击齐。曹、灌二人对韩信是亦步亦趋,形影不离,这两位丰沛故人集团的核心人物被置于韩信左右,恐怕不只是助韩信成其功业,他们被埋伏在韩信军中,随时防备着不测之变。公元前204年,荥阳被项羽攻破,刘邦与夏侯婴单车投奔韩信,不是直接到军中,而是“至,宿传舍”^⑮,唯恐韩信乘机图己,次日凌晨,才冒充使者突入韩信军中,收取其兵

权。由此可见,刘邦的戒备之深。事实证明,刘邦的担心和忧虑不是没有根据,随着战争胜负的日益明显,刘邦与他们的矛盾也日益尖锐,他们往往提出让刘邦难以容忍、接受的条件。公元前203年,楚军围困荥阳,事态危急时,韩信竟乘机请封齐王;次年,刘邦与韩信、彭越约定会击项羽,韩、彭却爽约,致使刘邦险些功败垂成,不得不扩大三人封地,且二人同时不赴约,有理由相信他们之间可能保持某种联系。这种事情的发生,严重伤害了刘邦与韩、彭的关系,只是此时正处于亡楚的关键时刻,刘邦不能发作,“当是之时,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顾力不能耳”^①,这种要挟发生后,刘邦就下决心准备铲除异姓王了。

刘邦与诸侯王集团既相互利用,又相互防备,这是他们关系的实质,刘邦借助他们的力量,结成广泛的同盟打败项羽,扫除了称帝的阻碍,而诸侯王企图助刘邦实现其未竟的野心,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是打败项羽,刘邦身为汉王,只是他们的共主,君臣名分很淡薄,“汉祖初兴,名非素定,君臣之间校材程力”^②,他们为了短期的目标而临时结合成一股力量,其间矛盾被激烈的战争所掩盖了。汉初,他们合作的基础由于刘邦的全面胜利而丧失,刘邦与诸侯王的关系只是战争时期松散隶属关系的一种延续。刘邦登上帝位,首先面临的政治问题是加强中央集权,诸侯王没有达到预先的欲望,又不可能满足现状,他们不仅要求王位,而且觊觎皇位,英布起兵时,就曾宣称:“欲为帝耳”^③,这使得他们同刘邦的矛盾扩大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这时候连那层淡薄的关系也不能维持了。刘邦称帝后,在实力和名分上占了优势,他开始着手解决这一问题,起初那种重在利用、兼有防备的关系走到了尽头。

项羽刚破,刘邦就再次收取韩信兵权,又封彭越为梁王,稳住彭越,兼有牵制楚地之意;因韩王信“材武”,韩地又是天下劲兵处,迁韩王信于太原。同时

大封同姓王,以刘贾为荆王,刘交为楚王,刘喜为代王,占据战略要地,牵制异姓王,拱卫中央。刘邦向异姓王磨刀霍霍,异姓王也没有坐以待毙,早在战争期间,他们就注意收容刘邦的反对派,力图形成自己的势力集团,一俟时机成熟,就同刘邦对立起来,谋求独立发展。项羽大将钟离昧在楚亡后投奔韩信,刘邦下诏追捕,韩信竟将他隐匿;而且,韩信在他的封国“行县邑,陈兵出入”^④,戒备很严。彭越在韩信亡齐后收留田横,这时,楚汉形势发生更大改观,受汉封为魏相国的彭越竟还“中立,且为汉,且为楚”^⑤,说明彭越还有谋求独立称王的意思,对刘邦保持一定距离。异姓诸王也明白,如果刘邦安排妥当,他们就会被一网打尽,趁着刘邦还在着手准备阶段,没有来得及行动的时候,猝然发动进攻,事态兴许还可挽回,于是燕王臧荼首先反叛,但这不仅坚定了刘邦的决心,也为他提供了口实。刘邦迅速消灭臧荼,这时异姓王开始了多蹇的命运,他们是“同功一体之人”,一反俱反,即使暂时没有反叛的意图,“自疑祸已耳”^⑥,干脆一反了事。刘邦在处置诸侯王集团时态度是坚决的,每次战起,他都亲自率军队平叛。危害刘氏天下、有可能颠覆刘氏政权的只有诸侯王集团能想得到,这一点刘邦有着清醒的认识,因此他不辨亲疏,只要有威胁皇权的可能,他就一律打击,包括自己的女婿赵王张敖和有手足之情的故友燕王卢绾。这样,刘邦仅仅用几年时间就消灭了势力强大的诸侯王集团。

诸侯王集团的覆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朝廷中居要职的封侯者集团始终坚定地支持刘邦,因此可以说,诸侯王集团实际上是败于封侯者集团之手,这充分说明了刘邦处理与其功臣集团间关系的远见卓识和正确立场。

注释

- ①④⑧ 《汉书·萧何曹参传》。
- ② 《史记·樊滕灌列传》。
- ③ 《史记·傅靳蒯成列传》。
- ⑤ 《汉书·樊滕灌傅靳周传》。
- ⑥ 《史记·留侯世家》。
- ⑦ 《汉书·张敖赵任申屠传》。
- ⑨⑩ 《史记·高祖本纪》。
- ⑪⑫ 《史记·项羽本纪》。
- ⑬⑭⑮ 《史记·陈丞相世家》。
- ⑯ 《汉书·酈陆朱刘叔孙传》。

⑰ 《十七史商榷》卷5“信自立为假王”条。

⑱ 《汉书·高帝纪》。

⑲ 《史记·淮阴侯列传》。

⑳ 《史记·季布栾布列传》。

㉑㉒ 《汉书·韩彭英卢吴传》。

㉓ 《资治通鉴》汉纪四,高帝11年“臣光曰”。

㉔ 柯维骐:《史记考要》卷9。

㉕㉖ 《史记·黥布列传》。

㉗ 《史记·田儼列传》。

[夏增民: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生。邮编 430079。

收稿日期:1997-08-06] [责任编辑:刘太祥]

略论东汉江南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陈昌文 王福昌

摘要 东汉江南自然资源,诸如气候、土地、水、动植物、矿产等得到了一定的开发利用。使江南形成了独特的技术——经济体系,促进了生产率的加速发展和人口的增加,改善了江南的自然环境。

关键词 东汉 江南 自然资源 经济发展

自然资源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以往的经济史在这方面重视不够。本文试就东汉江南^①自然资源开发的一般概况,自然资源在经济开发中的作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对生态环境的改造三方面作一初步的探讨。

1 东汉时期,由于种种自然的、社会的复杂原因,江南自然资源得到了一定的开发与利用。

(一)对气候资源的认识

以农业为主体经济形式的江南社会,很重视雨、霜等有关气候方面问题的观察。《续汉书·礼仪志》说:“自立春至立夏尽立秋,郡国上雨泽”。就是说整个农耕期,各地政府向中央上报降雨的情况。王充《论衡》载,“天且雨”,“琴弦缓”^②。就是讲假如天将要下雨的话,琴弦会变松。这是一种观测湿度的办法。又载:“朝有繁霜,夕有列光。”^③表明王充已知道霜与天象的关系。

王充在精心钻研、细心观察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了自己对云、雨、霜、风、雷等的一整套理论。他认为:“雨露凝者,皆由地发,不从天降”^④,“初出为云,云繁为雨”^⑤。他对森林有助于水气蒸腾从而降雨的现象也有深刻认识:“夫云气出于丘山,降散则为雨矣。人见其从上而坠,则谓之天雨水也。夏日则雨水,冬天寒则雨凝而为霜,皆由云气岁于丘山,不从天上降集于地,明矣。”^⑥所以《祭意篇》中他批评了当时“山林谷丘陵能出云,为云雨”,“皆曰神”的神话。又说:“天之旱也,山林之间不枯,犹地之水,丘陵之上不涸也。”^⑦“寒不累时霜不降,温不兼日则冰不释。”^⑧霜也是水气寒凝而至。“夫风者,气也”,认为风是气体流动的结果,而不是什么“天地之号令”^⑨。王充还在《雷虚篇》指出:“雷者太阳之激气。何以明之?正月阳动,故正月始雷。五月阳盛,故五

月雷讯。秋冬阳衰,故秋冬雷潜。盛暑之时,太阳用事,阴气乘之。阴阳分争,则相较。较射则激射,激射为毒,中人则死,中木木折,中屋屋坏。人在木下屋里,偶中而死矣。何以验之?试从一斗水灌冶铸之火,气激裂,若雷之音矣。或近之,必灼人体。天地为炉大矣,阳气为火猛矣,云雨为水多矣。分争激射,安得不迅?”这种解释尽管是直观的,有许多不科学的地方,但比当时社会上流行说法进步得多。

(二)土地资源开发与利用

其一,兴修水利,扩大水田面积。水稻是东汉江南的主粮,地方官往往重视兴修水利,以求扩大水田面积。如,顺帝永和五年((140年)会稽太守马臻兴建镜湖,“溉田九千余顷”^⑩。又如“木里沟是汉南郡太守王宠所凿,故渠引鄢水也。灌田七百顷”^⑪。仅镜湖一项工程所灌的九千余顷水田,就可让永和五年会稽郡每人分得近二亩的土地。这是大型的水利工程,至于中小型水利工程那就更多了。

其二,开发丘陵旱地,种植桑麻水果。南方地区地形复杂多样,丘山纵横。这为发展桑麻水果等园圃养殖业提供了良好的场所。王充说:“桑给蚕”^⑫,又说:“喻大以小,推民家事,以睹王廷之义,庐宅始成,桑麻才有,居之历岁,子孙相续”^⑬。说明王充时代江南的桑麻之业已盛。《后汉书》亦载茨充为桂阳太守后“教民种植桑柘麻之属,劝令养蚕织屨”,结果江南“颇知桑蚕织屨”^⑭。《太平寰宇记》引《城家记》载,汉宜春侯刘成于城中立五台“植桃万计”。《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注引《襄阳记》说李衡在武陵龙阳汜洲上作宅,种橘千株。可见,社会上还流行着大面积的水果种植业。晋人江统描绘的“秦汉以来,风俗转薄,公侯之尊,莫不植园圃之田”^⑮,确也是东汉江南社会的真实写照。

(三)水资源的开发利用

其一,蓄、排、防相结合,大兴水利工程,充分利用水资源。东汉的江南还没有得到很大的开发,河网密集,湖沼星罗棋布。既需要蓄水,也需要排水、防洪。江南人民因地制宜,兴修了芍陂、镜湖、朱湖陂、木里沟、白起渠等一批独具江南特色的水利工程。史载镜湖“在会稽、阴山两县筑塘,蓄水高丈余,田又高海丈余,若水少则泄湖灌田,如水多则开湖泄田中水入海,所以无凶年,堤塘周围五百一十里”^⑧。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排、灌、防相结合的综合性水利工程。豫章太守张躬在汉永元中筑的塘也有“兼遏”赣江洪水的性质。^⑨东汉江南兴建的有特色的水利工程跟魏晋以后的塘浦圩田农田水利有明显的渊源关系。

其二,利用丰富的水资源,发展水产养殖业。江南地区水资源特别丰富,宜于发展水产养殖业,自古以来就是著名的水产区。“民食鱼稻”、“渔猎山伐”^⑩是江南的一大特色。时到东汉,江南人民保持着“嗜鱼盐”^⑪、“食水产”^⑫的习俗。不仅如此,而且还用鱼喂养家禽,所谓的“以鱼食犬豕”^⑬,即反映了这种情况,其产量之大可见一斑。

东汉江南人民不仅捕野生鱼为食,而且兴起了有一定规模的人工养鱼业。如,汉襄阳侯习郁:“依范蠡养鱼法作大陂,陂长六十步,广四十步,当中起钓台。”又“引大池水于宅北,作小池鱼,池长七十步,广二十步”,池中“常出名鱼”。^⑭

其三,利用水道发展航运业。西汉时期,就有“吴地以船为家”^⑮的记载。表明水路交通已成了江南人民的命脉。东汉时,北方依然是政治中心,随着江南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央政府为了控制南方,便于南方物资的北调,更重视“沔水”、“湘水”、“赣水”的交通建设。如前所说到的张躬筑塘即其例。其主要目的就是“以通南路”。左思《吴都赋》形象地描绘了江南水路交通的繁忙景象:“观鱼乎三江,泛舟航于彭蠡,浑万艘而既同。弘舸连舳,巨槛接舻,飞云盖海,制非常模,叠华楼而岛屿,时仿佛于方壶。”

(四)动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

江南地区林深泽广,野生动植物资源异常丰富。西汉时期,渔猎采伐业在经济结构中就占据了重要地位。东汉时期,江南的动植物资源继续得到开发。

其一,利用量增加。《论衡》:“积金如山,燃炭火以燔炼之。”说明冶金业中,木材的利用量是很大的。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东汉时期江南动植物资源的利用范围也是很广的。随着人口的大幅度增加,社会

生产力的发展,利用范围广,而每个利用项目中利用量又很大,总利用量之大也是可以想见的。再则,值得一提的是,关中、关东人民的需求,也加速了江南地区动植物资源的开发。所谓的京师贵戚必欲“鞭楠豫章”^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其二,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认识水平、开发技术也大为提高。从考古发掘来看,其植物利用的工具已有刀、锯、凿、斧等种类,其中主要以铁制为主,铜器已居次要地位。^⑰从《论衡》、《说文》、《后汉书》的记载中可知,江南地区的渔猎方法有“弋射”、“掩”、“檻”、“阱”、“钩”、“网”、“罩”、“笼”、“叉”等等,根据方法不同所用的工具也各不相同。可见,动植物资源开发的工具已趋于多样化、合理化。东汉江南人民对植物的特性已有深刻的认识,如,“枫桐之树,生而速长,故其皮肤不能坚刚。树檀以五月生叶,后彼春荣之木,其材强劲,车以为轴。”^⑱对动物的生活环境、习性、动物群落原理,弱肉强食的自然竞争等方面也有了较深的认识,如《论衡·量知篇》载:“猩猩知往,乾鹊知来,禀天之性,自然者也。”再如《后汉书·宋均传》说:“虎豹在山,鼋鼍在水,各有所托,且江淮之有猛兽,犹北土之有鸡豚。”

(五)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

西汉时期,江南的矿产资源已有一定的开发,刘秀建立东汉以后,江南的矿产资源进一步得到利用。

其一,铁矿。西汉时期,广大的江南地区只有庐江郡的皖一处铁官^⑲,铁器的生产满足不了本地人民的需求,往往要从北方调入。东汉时期,地方官重视冶铁业的发展,这一现象有所改观。如,卫飒任桂阳太守时,在耒阳“上起铁官,罢斥私铸,岁所增入,五百余万”^⑳。其二,铜矿。西汉时期,江南就成了盛产铜的地区,特别是丹阳郡的铜矿,贮量丰富,铜石精良,享誉全国。东汉时期,江南的铜矿得到继续的开发,所以江南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铜镜制造中心,出现了别具一格的“神兽镜”和“画像镜”^㉑。其三,瓷土。东汉江南的瓷土资源得到了一定的开发。这可以从考古资料瓷器的出土中得到证实。解放后,江西、浙江等省发掘的东汉墓中出土了不少的青瓷器,尤其是浙江宁波出土的器物,器形端正均匀,造型美观大方,烧成温度高达 $1310 \pm 20^\circ\text{C}$,瓷胎烧结不吸水,显气孔率和吸水率分别是0.62%和0.28%,弯强度达710公斤/平方厘米,达到了很高的工艺水平。^㉒此外,黄金、铅、锡、丹沙、煤、石灰等矿产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开发。

2

人类的生产和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

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②。足见,自然环境是生产发展的物质基础与前提条件。在社会生产力尚未发达的东汉社会的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影响则更为深刻。

首先,它促使一整套独具江南特色的技术—经济体系的形成。

农业是古代世界决定性的生产部门。东汉江南初步地形成了一整套从生产工具、农作物品种,耕作技术到农业经济结构的技术—经济体系。江南地区丘山纵横,湖沼密集,富于酸性、粘稠的土壤状况,要推广犁耕,对耕犁的技术要求较高。而汉犁普遍的是三牛二人的所谓“耦耕”,这种犁一时在江南难于推广,因此,直到东汉章帝时,庐江百姓仍“不知牛耕”^③。所以,考古发现所见的翻土工具多是耨、锄、铲等。江南地区降水丰富,气候温暖,雨热同季,具有推广喜温、喜水作物的良好环境。水稻、桔等亚热带作物就成了独具特色的作物品种。人口稀少,又不便于推广牛耕的江南人民积累摸索出了一套“火耕水耨”的耕作经验。就是“烧草下水种稻”。在草和稻长到七八寸高时,将草除去,然后下水灌之,草死,而稻独长。除草、施肥两便。应当说这是一种适宜的耕作方法。江南地区草木莽莽、鱼兽较多,当地人民充分利用野生动植物资源,以“渔猎山伐为业”,可见在东汉江南的农业结构中,采集渔猎为主的农副业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也是江南的一大特色。过去的学者,往往过分拔高牛耕在当时的作用,又贬低因地制宜的“火耕水耨”的耕作方式,不知道耨、锄、铲等工具在生产中的重要性,把“渔猎山伐”看作是原始落后的象征,这是不符合当时江南实际的。

手工业和商业方面的影响也特别突出。建国以来的考古发掘证明,东汉江南地区的铜器制造业、漆器业、造船业、制瓷业是比较发达的^④。这与江南有丰富的铜矿资源、生漆资源、瓷土资源和便利的水路交通密切相关,这表明,东汉江南自然资源的特征直接规定了手工业技术结构。江南地区商业的发展亦有赖于南方丰富的野生动植物、竹木、皮革、奇兽等。过去学者们看不到或者不承认南方会有先进的手工业部门,而又有学者以江南存在某些先进的手工业而拔高江南在当时全国的经济地位,这也是没有深入研究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有深刻影响造成的。

第二,自然资源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和人口增加。

东汉时期,江南的农业生产率是大有提高的。光武时,江南的农业就有了进步。据载,李忠为丹阳

太守后,“垦田增多,三岁间流民占著者五万余口”,建武十四年,“三公奏课为天下第一”^⑤。到安帝时,生产率继续提高,二度出现了南粮北调的现象^⑥,这是江南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东汉末年,江南地区“士民殷富”^⑦,为吴国的建立奠定了经济基础。晋代的江南更是“谷米皆积数十年”^⑧。

东汉江南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又促进了人口的增加。东汉初的100余年间,人口增长了几倍。就全国而言,江南的地位逐渐上升,元始二年,江南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是8%,永和五年上升到16%。到三国时期更增长到34%^⑨。同时,农业的发展促使大量农业人口转移到手工业、商业领域成为非农业人口,也促进了人口职业结构的变化。

3 东汉时期,在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自然环境的改造方面也有了一定的成就。

其一,“卑湿”状况得到了一定的改造。“江南卑湿,丈夫早夭”^⑩,低下潮湿的自然环境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北方人民望之为畏途。西汉时期,江南人民就采取了若干改造措施,东汉人民在这方面的措施亦有不少。一是“编木为城”以防“下湿”^⑪。二是建立杆栏式的房屋。三是选择防潮向阳的地方建房、立墓。这些措施起到了明显的效果。东汉末年,人们对江南的观念有了很大的改变,北方人民已把南方称作“沃野千里,民富兵强”的“乐土”^⑫。

其二,传染病有了一定的防治。东汉江南人民为了防治传染病,特别重视饮食卫生。王充说:“鼠涉饮中,揖而不食”^⑬,又说:“天之太恶,饮食人不洁清”^⑭。著名的医学家张仲景提出二百多种“不宜”的吃法,其中很多就是防治传染病的。如,“六畜自死,皆疫死,则有有毒,不可食之”,“秽饮,馁饭臭鱼食之皆伤人”^⑮。同时也注重掩埋尸骨,以防病菌传播。如,质帝本初元年,诏:“九江、广陵二郡,数离寇害……死者委尸原野,方春戒节,掩骼埋胥之时,其调比郡见谷,收葬枯骸,务加理恤,以称朕意。”^⑯应该说东汉江南人口的大幅度增加跟传染病的防治有密切关系。

其三,在水资源的利用过程中,东汉江南的水土面貌有了较大的改观。《禹贡》说荆、扬二州的土地“涂泥”田为“下中”和“下下”,西汉初年,江南“地广人稀”、“丈夫早夭”^⑰,仍是一片荒凉之地。经过西汉,特别是东汉一代的改造,东汉末年便成了“沃野千里,士民殷富”的“帝王资之”^⑱之地了。

其四,在动植物资源的开发过程中,动植物的原始面貌有所改观。东汉江南人民在(下转第18页)

汉画所见汉代渔业生产初探

王 玉 金

摘要 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中有不少渔业生产图像。它反映出汉代的捕鱼方法有:徒手捕鱼,以网捕鱼,叉鱼,钓鱼,以罩捕鱼,鱼鹰捕鱼,水獭捕鱼。从而可以看出,汉代渔业生产有四个特点:一是渔业生产分布范围广;二是渔具和捕鱼技术比前代有了进一步提高;三是捕鱼涉猎范围广;四是汉代鱼种类较多。另外,从其它实物资料来看,汉代已专门养殖鱼类。汉代的渔业生产显示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

关键词 汉画 捕鱼 养鱼 技术

1 仅就本人目前掌握的资料,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中的捕鱼图像共有 20 余幅,主要分布在四个省:山东、四川、江苏北部、河南南阳。

山东出土汉代捕鱼画像数量最多,共计 15 幅,皆刻于画像石上。其中,微山 4 幅^①,邹县 2 幅^②,苍山 2 幅^③,临沂 1 幅^④,沂南 1 幅^⑤,滕县黄家岭 1 幅^⑥,临沂西张官庄 1 幅^⑦,嘉祥 1 幅^⑧,嘉祥五老洼 1 幅^⑨,肥城 1 幅^⑩。山东地近东海,空气湿润,雨量较大,水域较广,为鱼类生长提供了便利条件。这 15 幅捕鱼图中,捕鱼者各展技艺,生动地再现了汉代渔业生产的盛况。

四川汉画中共有 7 幅捕鱼图。其中,6 幅见于画像砖上,1 幅见于画像石上。彭县 2 幅^⑪,彭县义和 1 幅^⑫,广汉 1 幅^⑬,成都 2 幅^⑭,乐山(画像石)1 幅^⑮。四川盆地,地处我国西南部,属亚热带地区,雨量充足,河道纵横,水塘星罗棋布,为鱼类生长创造了十分便利的条件。四川汉画中的捕鱼图尽管没有山东多,但却很有特色。一是捕鱼画像主题突出,真实感强,水乡色彩浓厚,富有生活气息。这些图像着重表现捕鱼的场景,水域广阔,鱼类刻画得比较醒目,有游动之感。它不象山东汉画那样,捕鱼活动往往是在水树旁的水塘中进行,主题不突出。二是捕鱼活动涉猎面广。既有在一般水塘中捕鱼的,又有在荷塘中捕鱼的,更有在大江中捕鱼的。

江苏汉画像石中有 2 幅捕鱼图,1 幅出土于徐州^⑯,另 1 幅是在邳县收集的^⑰。江苏地处沿海,属海洋性气候,降雨量较大,水塘遍布,便于产鱼。邳县的捕鱼归来画像石刻画得十分形象逼真。

河南南阳汉画中,目前发现了 1 块捕鱼画像石^⑱,该石出自南阳县英庄汉画像石墓^⑲。南阳在东汉时有“南都”、“帝乡”之称,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起兵的地方,汉代政治、经济中心之一。南阳盆地,位于汉水流域的上游,处于我国南北交汇地带,降雨较多。河道有白河、唐河、湍河等,白河古称洧水,自古闻名,英庄汉画像石墓即位于洧水之滨。这幅捕鱼图,反映了汉代人在河道中捕鱼的场景。尽管南阳汉画中目前仅发现了一块捕鱼画像。但南阳汉画像石、画像砖中刻绘的众多鱼的画像却充分显示了当地盛产鱼类。南阳汉画中捕鱼画像较少,这与南阳汉画的表现主题有关,因南阳汉画着重反映豪家世族的生活情况,有关社会生产的图像不多。

大家知道,我国汉画像石主要分布在四大区域:山东苏北区、河南区、四川区、陕北晋西区。目前,除陕北晋西尚未见到捕鱼画像石外,其它几个地区都发现了以捕鱼为题材的汉画,但数量多少不一。这一方面反映了各地渔业生产发展情况不平衡,另一方面也与各地汉画像石(砖)着重表现的主题有关。

2 人类的祖先很早就和鱼结下了不解之缘。早在旧石器时代,我国东北的先民就已使用渔具捕鱼,辽宁海城小孤山洞穴就出土过骨制鱼叉^⑳。新石器时代,我国的东北、黄河中下游及华北地区的人们已掌握了数种捕鱼方法,使用渔具有网、钩、叉(镖)、鱼卡等。汉代时,捕鱼工具有了改进和提高,捕鱼方法趋向多样化。现将汉画像石(砖)所见汉代捕鱼方法介绍如下:

1、徒手捕鱼

徒手捕鱼一般是在浅水中进行。这种方法虽然原始,但却方便。四川彭县出土的捕捉鱼螺画像砖^②,画面上共有四人,或弯腰躬身,或跪于水中,正徒手捕捉鱼螺。从画面空间的鹅、鸭等动物的姿势来看,此水塘很浅。另外,山东微山、苍山、江苏徐州出土的捕鱼画像石都有徒手捕鱼的画面。山东邹县出土的一块画像石上所绘人物,有俯身抓鱼者,有提鱼站立者,还有一位捉鳖者^③。

2、以网捕鱼

网捕是一种高效率的捕鱼方法。我国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过陶网坠或石网坠,许多陶器上有网纹,说明当时人类已掌握了以网捕鱼的技术。春秋时的《诗经》中提到网、罟等,不同用途的鱼网有不同的名称。汉画像石(砖)捕鱼图中的网有三类。一类见于南阳汉画像石捕鱼图(图一)^④,画面刻一双拱桥,桥下水中有鱼儿游动,二人泛舟河心。其中一

人奋力荡桨,一人双手下罩,作捕鱼状。桥上有二人各持一杆,连结两杆的长索象征鱼网。画面右端刻一人戴冠着袍,似在观赏罟鱼。画左刻山峰,层峦迭嶂,山林中野兽出没。一派自然风光。此画像中的网是一种捕捞面积较大的鱼网,比较先进。其使用方法是,二人合力执杆先将鱼网放入水中,待鱼入网后,迅速将网提出水面,鱼便被捕获。另一类鱼网见于山东微山捕鱼画像石^⑤,此石左下角刻一鱼船,船右端的人正收网捕鱼。这种网的使用方法是先将鱼网撒开抛入水中,然后拉网出水,鱼便被捕获。第三类鱼网见于江苏徐州出土的捕鱼画像石^⑥,画面上,一人立于舟上,手拿带柄的挡网,持网出水,一条鱼蹦出网外,颇有情趣。这种鱼网属于小网。其使用方法是,看到鱼后,手持网柄,以网捞鱼。这是一种有针对性的捕捞方法。



图一 东汉画像石捕鱼图摹本(河南南阳出土)

网捕在汉代使用比较普及,网捕技术较前代有所提高。《说文》所列鱼网名称不下 15 种之多。历代鱼网的型制较多,大小有别,使用方法各不相同。依用法区分,大致有围网、罟网、拦网、杈网、赶网、板网、提罟等。据唐徐坚《初学记》引《风俗通义》说:“罟者,树四木而张网于水,车挽之上下”,说明汉代已成功运用机械网捕技术。

3、叉鱼

叉鱼是原始社会广泛运用的一种渔法,周王室曾设专职官员管理叉鱼事务,汉代人亦采用此法。原始社会使用的鱼叉(鏃)一般是骨制的。汉代时,冶铁业有很大发展,当时的鱼叉是铁制的,比较锋利。汉画像石捕鱼图中的鱼叉从形状分有两种,一种是双杈形的,另一种是鏃枪形的。出自江苏邳县的捕鱼归来画像石(图二)^⑦,画面上刻绘两个渔人,六只鸬鹚(鱼鹰),渔人肩扛鱼叉,手臂上立着鱼鹰,其中一只鱼鹰正从嘴中吐出一条鱼来,十分生动形象。此图中的鱼叉是双杈的。山东微山两城出土的捕鱼画像石^⑧,画面中部一人立于水榭斗拱之上,双

手举起一柄鱼叉,向一条大鱼刺去。这种鱼叉为鏃枪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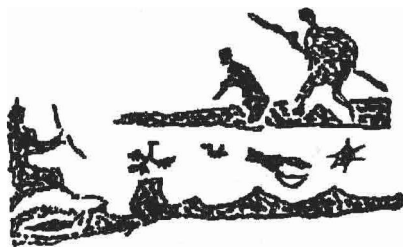


图二 捕鱼归来图局部摹本
(江苏邳县出土)

另外,在山东嘉祥等地出土的画像石上也有叉鱼场面。这说明叉鱼之法在汉代仍广为采用。从画像分析,当时的鱼叉是铁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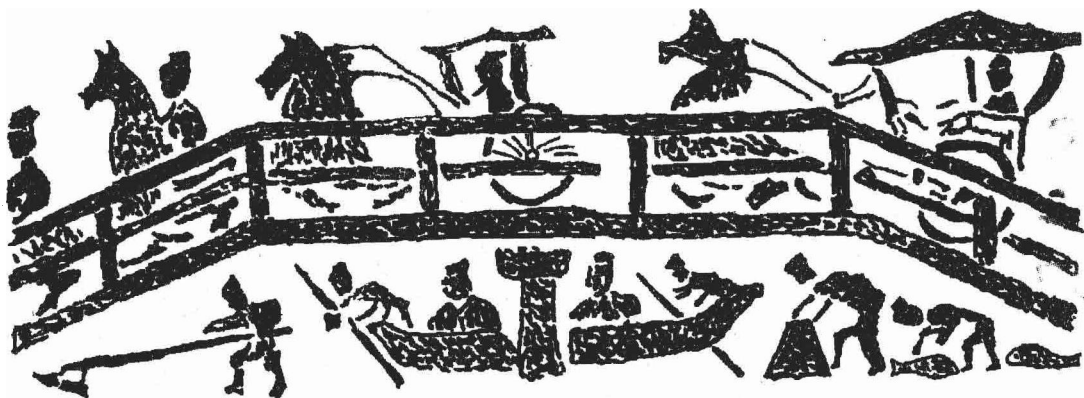
4、钓鱼

钓鱼之法在新石器时代即已出现。我国东北新石器时代出土的钓具不仅有鱼钩,而且有鱼卡^②。四川彭县汉代画像砖中有幅钓鱼图(图三)^③,在大江之上,一渔筏顺流而下,筏上有二人,前一人跪在筏边打捞水面上的漂浮物,后一人执长杆撑筏。画像左边有一垂钓者,从水面上拉出一条活蹦乱跳的鱼。在起伏的江岸上站立一鱼鹰,跃跃欲试。此画像以写实的艺术手法刻画出了一幅生动的渔猎场面。四川乐山出土的一块画像石上一垂钓者跪在岸边静候一条大鱼上钩,刻绘生动有趣^④。山东邹县画像石^⑤,刻一垂钓者,钓绳下有三条鱼争尝饵食,鱼在水下的活动生动地展现在观众眼前。另外,四川广汉、山东肥城等地画像石上也有垂钓的场面。



图三 东汉画像砖捕鱼图摹本
(四川彭县出土)

5、以罩捕鱼



图四 东汉画像石捕鱼图局部摹本(山东苍山出土)

7、水獭捕鱼

山东临沂西张官庄出土的画像石刻有两鱼两兽相对的场面,画中的兽短吻长尾。有的研究者将此画像定名为水獭捕鱼^⑥。水獭捕鱼之法一直沿袭至今。唐代文献对人工驯养水獭捕鱼亦有记载。现代四川、湖北一带有的渔民仍用水獭捕鱼。这幅汉画

以罩捕鱼是汉代渔猎画像石表现较多的题材。山东苍山出土的捕鱼画像石(图四)^⑦即有一渔人弯着身子,执罩捕鱼。山东微山、邹县、临沂、沂南、河南南阳画像石中,都发现有类似的画像。可见,用罩捉鱼是汉代人普遍采用的一种捕鱼方法。

罩具一般用竹条编成,底部为敞开的大口,上部有一小口。罩放入水中罩住鱼后,手伸进去把鱼捉出。画像石中的执罩者,有的卷着裤管,有的赤着上体。有的身后还背着鱼篓。这些渔人有的正在用力下罩,有的则在罩中捉鱼,一派忙忙碌碌的景象。罩适合在浅水中作业,虽然效率不高,但操作方便,成功率高。时至今日,我国有些地区仍用罩捕鱼。

6、鱼鹰捕鱼

鱼鹰,学名鸬鹚,善于捕鱼。人工驯养鱼鹰捕鱼,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鸛、鱼、石斧图是水鸟捕鱼的较早实物见证。黑龙江省密山县新开流遗址出土的骨雕鹰首,刻画出了鱼鹰引颈腾空、寻觅猎物的生动形象,反映了人们借助长期驯养鱼鹰从事捕鱼的生产情景^⑧。汉画中有不少鱼鹰捕鱼的画面。山东微山捕鱼画像石^⑨,右下有一鱼鹰正引颈取水中之鱼。江苏徐州捕鱼画像石^⑩刻画的鱼船上立一鱼鹰伺机捕鱼。另外,江苏邳县、四川彭县、广汉等地画像石上均刻画鱼鹰,可见汉朝时人工驯养鱼鹰已广泛用于捕鱼。

像是水獭捕鱼的最早实物例证。

另外,山东苍山^⑪、沂南等地捕鱼画像石上,刻有一种渔人手持长柄,柄端装有箕形物用以捕鱼的画面。王仁湘先生将其称为箕捞。

3

通过对汉画像石(砖)中的渔业生产图像进行综合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汉代渔业生产有以

下几个特点。

其一,渔业生产分布范围广。四川、江苏、河南等地 10 多个县(市)均发现有捕鱼画像石或画像砖,画像内容丰富多样。说明汉代时,无论是长江流域,还是黄河流域,无论是内陆地区,还是沿海地区,都存在着渔业生产。汉代时,尽管农业生产取得了较大发展,粮食已成为人们的主食,但是,由于肉食、特别是味道鲜美的鱼类具有丰富的营养,所以许多地区的人们仍喜爱捕鱼,把鱼作为补充食物。汉代在一定时期内,比较重视渔业生产。正如《后汉书·刘般传》所云:“民资鱼采,以助口实。”

其二,汉代的渔具和捕鱼技术比前代有了进一步提高。汉代时,随着整个社会物质条件的进步和人类生产经验的积累、智慧的提高,渔具和渔技随之有所发展。汉代冶铁业的迅速发展,推动了鱼叉、鱼钩等渔具的改进,出现了锋利而且安装、使用方便的铁制鱼叉、鱼钩。鱼网的种类比以前增多了,网捕技术有所提高。伴随人类聪明才智的增进,汉代人在沿袭前代驯养鱼鹰捕鱼的基础上,开始驯养水獭捕鱼,这是汉代新出现的一种捕鱼方法。这些大大提高了捕鱼效率,增加了汉代渔业生产的产量。

其三,捕鱼涉猎范围广。既有在普通水塘中捕鱼的,又有在荷塘中捕鱼的,还有在中小河流中捕鱼的,更有在大江中捕鱼的。山东汉画像石中的捕鱼

图大多表现的是在普通水塘中捕鱼的场面。四川彭县出土的荷塘渔猎画像砖^②表现的是在荷塘中捕鱼的场景;在一个荷塘内有两条鱼船,船边有鱼。船上的人,有的在撑船,有的在捕鱼。河南南阳出土的捕鱼画像石^③表现的是在中小河流中捕鱼的情景。四川彭县出土的钓鱼画像砖(图三)^④表现的则是在大江中捕鱼。

其四,汉代鱼种类较多。从汉画看,汉代渔业生产捕捞的对象是鱼、鳖、螺等。汉画中的鱼又可分为鲤鱼、鲫鱼、鲢鱼等。例如,《南阳汉代画像砖》^⑤拓本 83 刻绘的鱼,体侧扁,嘴边有触须,明显为鲤鱼。而该书拓本 69、81 中的鱼,体侧扁,背脊隆起,当为鲫鱼。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汉代四川一带,螺也是渔猎的对象。四川彭县出土捕捉鱼螺像砖,刻绘四个渔人正捕捉鱼螺^⑥。四川西昌出土的陶鱼塘模型内也有螺。

另外,从四川出土的陶鱼塘模型看,汉代已专门养殖鱼类。四川成都、西昌等地出土有东汉陶鱼塘模型^⑦。这些鱼塘模型内有众多鱼类,中部有横堤,把鱼塘分为若干小区,横堤中间有缺口,便于各区水流相通。四川西昌出土的一具陶鱼塘模型分为内外两个区域,塘内有鱼、鳖、螺等^⑧。四川成都东郊出土的一具陶鱼塘模型,底部用阴线刻画出许多条鱼^⑨。这些鱼塘是专门养殖鱼类的。

注释

①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图 3—59、64、66、67,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年 12 月。

②④⑤⑩⑪⑫⑬⑭⑮王仁湘《钓者静之 罩者抑之——画像石所见汉代捕鱼方法》,《文物天地》1993 年第 3 期。

③⑥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图 3—68、70。

⑦见《农业考古》1981 年第 2 期第 48 页。

⑧⑨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图 3—61。

⑩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图 3—60。

⑪《文物》1982 年第 5 期第 72 页。

⑫一幅见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图 3—50,另一幅见《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画像石、画像砖卷图版 192,上海美术出版社,1988 年。

⑬⑭⑮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图 3—62。

⑯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图 3—63。

⑰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图 3—45、47。

⑱⑲⑳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图 3—58。

㉑㉒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图 3—69。

㉓㉔㉕王建中等《南阳两汉画像石》图版 3,文物出版社,1990 年 6 月。

①②南阳地区文物工作队、南阳县文化馆《河南南阳县英庄画像石墓》,《文物》1984 年第 3 期。

③张镇洪《辽宁海城小孤山遗址发掘简报》,《人类学学报》第 4 卷第 1 期。

④⑤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图 3—50。

⑥⑦⑧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图 3—65。

⑨⑩刘俊勇《我国东北新石器时代渔业生产初探》,《考古与文物》1991 年第 2 期。

⑪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图 3—66。

⑫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图 3—68。

⑬《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画像石、画像砖卷,图版 192,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 年。

⑭赵成甫等编著《南阳汉代画像砖》,文物出版社,1990 年 5 月。

⑮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图 3—29 至 32。

⑯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图 3—31。

⑰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图 3—32。

[王玉金:河南省南阳市南阳汉画馆。邮编 473000。收稿日期:1997-09-12] [责任编辑:刘太祥]

西汉梁国与七国之乱的平定

高建立 刘大伦

摘要 公元前 154 年,因汉景帝实行削藩,导致七国反叛。梁作为藩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乃汉之东部屏障。加之梁孝王刘武忠于中央政府,足智多谋,广济贤才能将,力抵叛军,终使吴楚叛军不能越梁而西进,保证了汉军在战略全局上的主动,从而最终赢得七国之乱的平定。

关键词 梁国 刘武 七国之乱

一、梁国在平定七国叛乱中的作用

西汉文、景之时中央政权与藩国势力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论:“至文、景之世,功臣外戚之患皆除,而同姓诸王,转为治安之梗也。”^①梁太傅贾谊也曾上文帝《治安策》,提“众建诸侯而少其力”^②的主张。文帝接纳此议,把王国划小,并将亲子刘武封于梁,以为屏障,更加剧了这一矛盾的发展。

吴乃大国,依山铸钱,煮海为盐,素有骄奢之名,至中央实行削藩,将要威胁到吴国利益时,早有异志的吴王刘濞便联合楚、赵等六国发动叛乱,合力对抗中央政权。论其细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两点:

第一,吴与中央有隙已久。孝文帝时,吴太子入宫,得侍皇太子饮搏。因双方年轻气盛,发生争执,皇太子气不过,便随手提起棋盘,击吴太子,致死。文帝赐葬太子于吴。吴王则认为天下一家,死于京师即葬京师,不让还吴。吴王因太子事而生“怨望,稍失藩臣礼称疾不朝”^③,就此埋下谋反祸根。

第二,削藩之举威胁到吴国的根本利益。孝景帝即位后,晁错为御史大夫,他上书劝皇帝实行削藩,认为藩国地大势强,不利中央控制,不如早削;迟削,就会积下大祸。景帝纳其言,乃削楚、赵、胶西三国之地。待削吴会稽、豫章书至,吴王恐削地无已,乃谋反起兵。

上述二原因,第一点是远因,第二点是近因,亦是最根本的原因。

此外,吴王濞素以大国自居,早有不臣之心。他自己曾对诸王讲,“寡人节衣食用,积金钱、修兵革、聚粮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凡皆为此,愿诸王

勉之。”^④所谓“凡皆为此”,即是指谋叛一事,足见刘濞素有异志。加之吴乃藩国中之大国,据《汉书·荆燕吴传》记载:“昔高帝初定天下……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齐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吴五十余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足见吴国之大。吴王刘濞因平黥布反,立下战功,故得以继承刘仲的封地吴。吴国广大的疆域,饶足的国用,为其谋反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经济基础。

从史书记载可以看出,吴楚七国初起兵时,来势甚猛。且吴楚乃大国,几分汉天下半,若联合七国之力量,则其势之大可想而知。吴王发兵时曾言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诸年上与寡人比,下与少子等者皆发”。如此,仅吴一国之兵力即达 20 余万,号称 50 万,加之其它六国及南越增兵,数目相当可观,决非梁国可以抵挡。难怪开战之初,“吴王之渡淮,与楚王遂西败棘壁(今河南省柘城县东北),乘胜而前,锐甚”^⑤,大有破竹之势。梁国全力抵抗,结果又大败。致使梁国屡次上书皇帝,请发救兵。天子遣太尉周亚夫将三十六将军往击吴楚,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击齐,大将窦婴屯荥阳,监齐赵兵。出于战略全局的考虑,周亚夫并未急于救梁,结果使梁孤军奋战,与吴楚拼斗。梁国作为抗击七国的前沿,也是拱卫京洛的要地。如果吴楚破梁西进,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对此,梁孝王刘武也是有清醒认识的,这从梁将韩安国的一段话中看得很清楚。韩安国为梁使,他在拜见长公主时说:“夫前日吴、楚、齐、赵七国反,自关以东皆合从而西向,惟梁最亲,为艰难。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诸侯扰乱,宣言泣数行而下,跪送臣等六人将兵击却吴

楚,吴楚以固兵不敢西,而卒破之,梁之力也。”^⑥正是梁孝王考虑到皇帝、太后的安全、中央政权的稳固,不惜屈万金之躯,跪送将土出兵力抗吴楚,方使叛军不能西向威胁京洛。其功之大,不言自明。梁军阻吴楚西进,何以对皇室的安危、中央政权的稳固有如此重大意义呢?这与当时的形势有关。西汉政权初建时,刘邦就打算定都洛阳。洛阳乃东周都城,地理位置优越,只是娄敬首倡都于关中之议,加之张良等谋臣的赞助,高祖方定都长安。但洛阳之重无逊于长安,西汉一直视洛阳为关中屏障。

其实,吴楚七国反叛之初,吴将曾劝吴王西进,说:“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愿大王所过城不下,直去,疾西据洛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无入关,天下固已定矣。”^⑦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占据洛阳武库、敖仓粮仓是何等重要。可惜吴王不从其计。

吴楚七国攻梁甚急,梁王屡求救,而周亚夫迟迟不肯发兵,亦是出于护卫洛、荣之固。如果周亚夫倾兵救梁,若吴楚乘隙扑来,抢占洛、荣,则局势将不堪收拾。故周亚夫从战争全局考虑把梁推到战争的前沿,以挡叛军。事先周亚夫曾问计于邓都尉,都尉谋曰:“吴兵甚锐,难与争锋。楚兵轻,不能久。方今为将军计,莫若引兵东北壁昌邑,以梁委吴,吴必尽锐攻之。将军深沟高垒,使轻兵绝淮泗口,塞吴粮道。使吴梁相敝而粮食竭,乃以全制其极,破吴必矣。”^⑧邓都尉的计策有二:一是塞吴粮道,使其不战自溃;二是要想塞吴粮道,就必须以梁委吴,使吴梁拼消耗。如此,周亚夫方能调兵遣将,屯兵昌邑,以绝淮泗(今山东境内)。很显然,梁国成败事关战争全局。如若梁国抵挡不了吴楚进攻,那么,吴楚叛军就有可能长驱直入洛、荣,逼进关中,威胁长安,也就无从谈起周亚夫率军屯昌邑,绝淮泗,塞吴粮道以破吴楚了。七国之乱的平定,梁国是功不可没的。梁将韩安国所言吴楚不敢西,而卒破之,皆“梁之力也”,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二、梁国能够阻止吴楚叛军西进的原因分析

七国叛乱,来势凶猛。面对吴楚大军压境,梁国

奋力抵抗,终于阻止叛军西进,使汉之战略目标得以实现,足见梁国在平叛中的重要作用。梁国何以能阻吴楚,使之无法西进?笔者认为有以下两点原因:一是梁国疆域辽阔,国力雄厚,具有抵御七国的坚实基础。梁国初建之时,刘邦就诏令“以魏故地王”彭越,疆土南至睢阳,北至谷城(今山东平阴),地域相当大。文帝时,“徙淮阳王武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得大县四十余城”^⑨。梁孝王时期,梁国疆域达到最大,南至新鄴(今安徽太和),北至古黄河与赵国为邻,西至高阳(今河南杞县),东与泰山郡、鲁国接壤。这一带地理位置优越,平原广布,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适宜农作物生长。东北部有丰富的矿藏可以冶铁,物产丰饶。因梁国自然条件优越,疆域广大,人口资源也十分丰富。梁国强盛时,人口达250万左右,加之当时适逢文景“盛世”,社会安定,生产发展较快,百姓富殷,为以后平定七国叛乱提供了物力、人力上的保证。二是汉室用人得当,刘武忠于职守,方使吴楚叛军无法越梁西进。梁孝王刘武乃文帝第二子,长子即是孝景帝,同出于窦太后,太后非常宠爱刘武。刘武以聪惠受封于代为王,后徙淮阳王。梁怀王刘揖坠马死后,梁太傅贾谊面奏文帝曰:“臣之愚计,愿举淮南地以益淮阳,而为梁王立后,割淮阳北边二、三列城与东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即刘武初封)而都睢阳。梁起于新鄴以北著之河,淮阳包陈以南榷之江,则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梁足以捍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陛下高枕,终无山东之忧矣,此二世之利也。”^⑩文帝听从贾谊之计,“乃徙淮阳王武为梁王”^⑪。文帝迁梁王武于睢阳,并扩大其疆土,目的在东捍齐、赵以卫朝廷。以此观之,中央对吴楚齐赵早有疑心,使刘武为梁王,也是抵御吴楚等国谋反事先布下的一颗棋子。梁孝王也的确没有辜负皇帝的良苦用心,始终以屏卫朝廷东方为己任,高筑城、深挖池、严壁垒。吴楚叛军犯,梁孝王“飭车骑、习战射、积粟固守”,梁王还亲自城守睢阳,屈尊跪送韩安国等将上阵御敌,“张羽力战”、“安国持重”^⑫,终使吴楚不能越梁而西,从而有力地保证了汉军在战略全局上的主动。

注释

①《秦汉史》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81页。

②③④⑤《汉书·贾谊传》。

③④⑤《汉书·荆燕吴传》。

⑤⑦《史记·梁孝王世家》。

⑥⑫《汉书·韩安国传》。

[高建立:商丘师专《黄淮学刊》编辑部。刘大伦:商丘师专图书馆。邮编476000。收稿日期:1997-08-12]

[责任编辑:刘太祥]

中州士人与汉代政治[※]

黄宛峰

摘要 西汉时期,中州士人在整体上并不活跃,但贾谊、晁错在政治文化方面、桑弘羊在经济理论方面都有很高的建树,对封建社会初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以刘秀为代表的、具有浓重儒学色彩的东汉政权建立后,作为文化中心,中州广被儒教,孕育了士人重名节的风气,清议之风由此波及全国,最终形成了以中州士人为核心和骨干的党人。士人的忧患意识与献身精神至此得到了最明确集中和淋漓尽致的表现。这是中州士人最为宝贵的性格。

关键词 政治文化 名节 忧患意识

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其发展与知识分子的作用息息相关。而中州士人在当时的政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对此作一粗浅的探讨,以求指正。

一、张良、陈平与汉初政局

张良、陈平在佐助刘邦建立汉王朝的过程中,往往于关键时刻起到重大作用,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此处不再赘述。汉王朝建立后,张良因一向体弱多病,未担任具体官职,并表示“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但实际上并未游离于政治之外。他“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①,他与刘邦从容所谈的具体内容虽不可知,但毫无疑问,其中的绝大部分是涉及到新生政权的巩固问题。《史记·律书》曰:“高祖有天下,三边外畔;大国之王虽称蕃辅,臣节未备。会高祖厌苦军事,亦有萧、张之谋,故偃武一休息,羁縻不备。”这里的“萧、张”应当是指萧何、张良。此外,张良建议刘邦急封雍齿以平未封功臣之疑虑;力主刘邦听从蒯彻之议,放弃洛阳而定都“金城千里,天府之国”的关中;为吕后出谋,保住了太子刘盈的位置。这一切都是为巩固汉家王朝着想,显现出他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

较之张良,陈平在政治舞台上要活跃得多。在平定异姓诸侯王方面,他出计轻而易举地擒拿了天下无敌手的骁将韩信,后又随刘邦参加征伐陈豨、黥布的斗争。刘邦死、吕后掌权时他隐忍不发,与手握

重兵的周勃交好以待时机;吕后去世,他立即与周勃合谋诛灭诸吕势力,迎立代王为文帝。从而使西汉皇权得以平稳过渡,避免了动乱,历史进入相对和平发展的时期。文帝即位后,陈平与周勃同为丞相,他自认为在平诸吕之乱中周勃功高,主动以右丞相让周勃,他为左丞相,位居第二。然而周勃毕竟是武夫出身,对国家大事难以理出头绪。当文帝问到天下决狱、钱谷之事时,周勃“汗出洽背,愧不能对”。文帝转而问陈平,陈平从容回答:“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文帝又问:“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陈平胸有成竹,侃侃而谈:“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②此次朝对以后,周勃“自知其能不如平远矣”,于是谢病请罢相,陈平独任丞相一直到前 178 年去世。陈平年青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从他与文帝的上述对话中可知,他在政治上自觉遵循着求同存异、大体相安即可的黄老思想,不喜察察之慧,不为烦苛之事。陈平是黄老思想的信奉者,又是黄老政治的推行者,对于汉初社会生产的恢复、社会生活的安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清代史学家赵翼称汉初的“布衣将相之局”为前所未有的“天地一大变局”。这种布衣将相之局得以巩固而不至于被颠覆,汉初政局得以稳定发展,张良、陈平两位老臣功不可没。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河南汉文化研究》成果之一

二、贾谊、晁错、桑弘羊与西汉政治文化建设

贾谊、晁错、桑弘羊处于西汉不同的时期。贾谊生活在文帝时期，晁错仕文、景两朝，桑弘羊活跃于武帝、昭帝之世。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政治形势、政治特点，但西汉前期、中期，政治上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如何加强中央集权制、巩固统一。在这个重大问题上，贾谊、晁错、桑弘羊都有着突出的贡献。

贾谊、晁错、桑弘羊本属于不同的学术派别。贾谊“能诵诗属书”、“颇通诸子百家之书”^③，他的思想中有法家、道家的成份，但主要是儒家。晁错曾学中商刑名，是法家思想的代表。桑弘羊，从《盐铁论》中可见，他对儒家典籍很熟悉，能随口证引其中的句子。而证引的目的却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来反驳贤良文学。他的主要思想体现的是法家精神。三人的学术渊源各不相同，然而异曲同工，在巩固和发展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问题上非常一致。

较之同时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贾谊的杰出之处在于：（一）深刻总结秦亡教训，高度弘扬儒家的民本观。汉初对于秦亡教训的自觉总结，最早是楚人陆贾。文帝时，颍川人贾山曾在上书中“言治乱之道，借秦为喻，名曰《至言》”^④。南阳人张释之也在文帝面前“言秦汉之间事，秦所以失而汉所以兴者久之，文帝称善”^⑤。然而这一切都不及贾谊的《过秦论》明快集中。贾谊将秦亡的原因归结为一句话：“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他对于秦灭六国统一天下的功绩予以充分肯定，认为秦亡在不懂得“取与守不同术”。而守天下的“术”，贾谊已意识到最值得重视的力量是民众。《新书·大政上》讲：“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接着又讲“民无不为本也”、“民无不为本也”、“民无不为本也”。本、命、功、力四个方面，贾谊首先强调的是“本”。“本”即根本，他认为民众是“大族”，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国家的基础，是制约国家命运、决定国家兴衰的根本力量，看似卑贱却威力无穷：“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雠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他反复告诫统治者：“夫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故夫民者大族也，民不可不畏也，故夫民者多力而不可适（敌）也。呜呼，戒之哉！戒之哉！与民为敌者，民必胜之！”如此响亮地提出民本的口号，如此明确地强调民众的地位，是贾谊对中国政治文化的贡献。民本思想早在西周时期即已萌芽，孟子、荀子对此都有所论述，荀子“水则载舟，水

则覆舟”之论更成为千古名言。但先秦的思想家未亲见“覆舟”之祸，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认识民众的威力。秦末民众的壮举，使汉初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开始正视民众。贾谊对民众历史地位、历史作用的高度评价，深化了儒家政治思想中的民本观，将民本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二）明确提出以礼治国的政治主张。汉初鉴于秦亡教训，陆贾提出“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贾山认为“秦不笃礼义，故天殃已加”，这些都是合乎逻辑的自然而然的推论，是比较直观、粗浅的，贾谊则从理论的高度，精心构筑了礼治的一整套思想体系。礼治是儒家政治思想的灵魂，而礼治的核心是等级制。贾谊是汉初对等级制进行系统探讨的第一人。他形象地比喻等级制为：“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故陛九级上，廉远地，则堂高；陛亡级，廉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故古者圣王制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延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⑥他要求将这种“阶级”制度化：“岂如今定经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若夫经制不定，是犹度江河亡维楫，中流而遇风波，船必覆矣。”^⑦“经制”即在服饰、器皿、制度、名号等方面都区别出不同人等，使“尊卑贵贱，明若白黑”。等级既明，礼的秩序即可建立，社会的治理也就易如反掌了。关于礼在社会中的作用，贾谊有一段集中的论述：“故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⑧这段话被《礼记》的首篇《曲礼》全文抄录，从而成为后世儒家阐明礼治重要意义的经典性论述。贾谊不仅是思想家，还是政治家。他在理论上对礼治作了深入的探讨，在现实生活中也力主统治者付诸实践。北方的匈奴侵扰问题，地方上的诸侯王、豪强大姓僭越无度问题，民间的风俗浇薄问题，都是从礼治的角度提出的。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贾谊在强调礼治的同时不废法治。他认为“礼者禁于将然之前，法者禁于已然之后”^⑨，最好是以礼义教化民众，使之绝恶于未萌。但教化并非万能，因而需要有法制辅之。他所谓的“法”，一是传统意义上的法：“仁义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⑩，仁义恩厚行不通时，就要动用权势法制，如对诸侯王问题。二是定礼制为规范，使之具有法的作用。儒家的礼治